

莲池书院艰难发展的历史，印证了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发展的艰难历程。在这段艰难的历史进程中，形形色色的政治家、教育家、学
问家在不同时期起着不同的作用，对清代尤其是晚清的教育和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

莲池书院研究

罗哲文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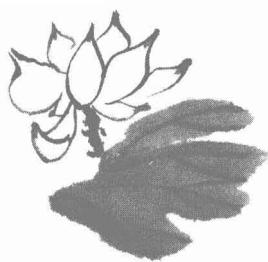


柴汝新 /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莲池书院研究



主 编 / 柴汝新
副主编 / 孙 月

《莲池书院研究》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国英 周省时

副主任：高 玉 赵其国 王淑彦 王胜利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孙 月 吕志毅 吴洪成 陈美健

苏禄煊 康广河 柴汝新 彭阿凤

河北大学出版社

莲池书院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莲池书院研究 / 柴汝新主编. —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5666-0012-7

I. ①莲… II. ①柴… III. ①书院-保定市-文集
IV. ①G649. 299. 2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13139号

LIANCHISHUYUANYANJIU

封面题字: 罗哲文

责任编辑: 王殊宁

胡素杰

装帧设计: 赵 谦

责任印制: 靳云飞

出版: 河北大学出版社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1 / 16 (710mm × 1000mm)

字数: 400千字

印张: 23.75

版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66-0012-7

定价: 68.00元

序 言

保定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人文历史荟萃。莲池书院是清代直隶省的最高学府,雍正十一年(1733年)由直隶总督李卫奉诏而建,建于素有“城市蓬莱”之称的古莲花池内,并以莲池冠名书院。莲池因书院而著名,书院因莲池园林秀美,聚引学子,弘扬教化而声播四方。莲池书院成立后的一百七十年间,这里不仅名师荟萃,而且人才辈出。章学诚、黄彭年、张裕钊、吴汝纶等硕儒名家曾执教于此,也曾涌现毕沅、冯国璋、傅增湘、张继等高官显宦,还培育出贺涛、刘春霖、吴闿生和宫岛大八(日本)等文学高材,以至形成以保定为中心的“北方桐城文派”和在日本的“张裕钊书派”。当时和稍后的文人称誉莲池书院为“北方文化的渊藪”。1952年毛泽东主席视察古莲花池时说:“莲池有名,是因为有莲池书院,莲池书院当时在全国是很有名的。”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开始对莲池书院进行研究。改革开放后,研究氛围日趋浓厚,但多是自发的,还没有一个组织机构或专人进行系统整理。为了适应当前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和进一步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莲池书院研究会成立后,编者广泛征集资料,系统整理近年全国研究成果,结集出版《莲池书院研究》,填补了国内学术空白。从书中作者看,有全国十余所高校历史、人文教授,博士生导师,有长期关注、研究书院的专家学者,体现了研究的高层次;从书中内容看,既有对书院的总体研究,又有院长、学生、教学、经费、图书等个体研究;既有书院珍藏的碑刻资料,又有新征集的清宫珍藏的史料,可以说内容十分丰富。概览了书中篇章,发现一部分学术造诣很深,很受教益。这本书为学习、研究莲池书院的同志,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当然,有的研究文章还有待于深入一步,如研究莲池书院对今天的教育、文化建

设有哪些启示等挖掘还不够。本书编者柴汝新同志身为莲池博物馆一把手,在做好管理和接待等工作的同时,刻苦钻研业务,从一名团职转业军官,不数年间,已成为莲池书院研究之专家,可喜可贺。本书的出版发行,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这对弘扬保定传统文化,建设文化保定有着重要的意义。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加入莲池书院的研究队伍,也希望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愿莲池书院研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中共保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二〇一一年九月

贺莲池书院研究会成立^①

柴汝新

百年书院育英贤，^②
主席美誉声名远。^③
书院旧址新楼建，^④
古城文人倍心寒。
文化大市来召唤，^⑤
协会成立始扬帆。
但愿研究结硕果，
保定文化谱新篇。

① 莲池书院研究会成立于2009年6月8日。6月17日，中共保定市委书记宋太平、市长于群在古莲花池为莲池书院研究会揭牌。本诗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诗歌征文而作，刊于2009年11月26日《保定日报》B4版，获“金阳地产杯”诗歌征文大赛优秀奖。

② 莲池书院创于1733年，终于1903年，历时170年。

③ 1952年11月，毛泽东主席视察莲池时说，莲池有名是因为有莲池书院，莲池书院在当时是很有名的。

④ 2000年在书院旧址上建现代楼一座。

⑤ 2008年，市委、市政府将恢复莲池后三景，组建莲池书院研究会作为文化大市建设二十项任务之一。

目 录

序言	李国英(1)
贺莲池书院研究会成立	柴汝新(1)

一、总论

1. 莲池书院和传统文化的继承与革新	曹子西(2)
2. 乾隆皇帝与莲池书院	柴汝新(10)
3. 直隶总督与莲池书院	陈美健(13)
4. 曾国藩与莲池书院	彭小舟 周晓丽(19)
5. 曾国藩与保定莲池书院	吴 蔚(26)
6. 李鸿章与莲池书院	吕志毅(34)
7. 李鸿章与莲池书院	杨佑茂(39)
8. 莲池书院与晚清直隶文化	靳志朋(42)
9. 从经世致用到融合中西	靳志朋(51)
10. 清代保定莲池书院与科举制度	吴洪成 李占萍(59)
11. 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失落	吴洪成 李占萍(73)
12. 保定莲池书院与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	吴君楠 李占萍 于 洋(83)
13. 浅谈莲池书院的复兴	柴汝新 彭阿凤(92)
14. 莲池书院恢复何其难	柴汝新(94)

二、院长、讲席

1. 直言敢谏的工部侍郎尹会一 柴汝新(98)
2. 章学诚的治学思想 俞兆鹏(100)
3. 章学诚与直隶书院教育 董从林(108)
4. 章学诚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始末 柴汝新(113)
5. 章学诚和他的《师说》 朱耀儒(117)
6. 祁韵士传略 王海德(119)
7. 赵未彤轶事 柴汝新(122)
8. 何秋涛传略 (124)
9. 何秋涛与《朔方备乘》的多舛命运 柴汝新 苏禄煊(125)
10. 晚清知名学者、教育家黄彭年 龙尚学(128)
11. 黄彭年与晚清直隶文化 吕志毅(131)
12. 黄彭年与“琅环之犬” 柴汝新 苏禄煊(136)
13. 李嘉端生平 (138)
14. 朝考受挫,终身不仕的王振纲 柴汝新 苏禄煊(139)
15. 张裕钊教育思想初探 叶贤恩(141)
16. 论张裕钊的教育思想 张淑芳 张熙君 付文娟(146)
17. 张裕钊与《重修南宮县学记》碑 田 伟(150)
18. 放眼世界的莲池书院院长吴汝纶 柴汝新 苏禄煊(154)
19. 吴汝纶与莲池书院 汪效驷(157)
20. 莲池书院与以吴汝纶为中心的古文圈子的形成 柳春蕊(162)
21. 吴汝纶在保定莲池书院的事业与思想探析 苏国安 吴洪成(172)
22. 吴汝纶弃官从教辨析 董从林(183)
23. 论吴汝伦教育思想 江小角(205)
24. 张裕钊与吴汝伦教育思想的共同特征 江小角(217)

三、学生

1. 从莲池书院走出的状元毕沅 柴汝新(225)
2. 近代文化名人贺涛 杨佑茂(228)
3. 燕地贾恩绂手稿中所见桐城派学者资料 吴秀华(233)
4. 近代著名方志编纂学家王树枬 郭晨峰(238)
5. 冯国璋传略 (243)
6. 刘春霖传略 刘宗唐(245)
7. 末代状元刘春霖 郝毅生(248)
8. 刘春霖“卖字” 柴汝新 苏禄煊(253)
9. 傅增湘传略 (255)
10. 力矫俗弊的李刚己 柴汝新 苏禄煊(259)
11. 张继传略 (261)
12. 邢赞亭与天津生生工厂 常来树(263)
13. 宫岛大八留学在保定 柴汝新(266)

四、其他

1. 论保定莲池书院的课程与教学 吴洪成 苏国安(271)
2. 清代保定莲池书院的办学经费及其效益初探 吴洪成 张彩云(280)
3. 清末莲池书院刻印图书浅析 李 墨 王丹阳 郭 佳(295)
4. 清代学者何绍基与莲池书院的深厚情意 吴佩琦(300)
5. 那彦成、赵孟頫与《蜀山图歌》 柴汝新(302)
6. 齐白石与《莲池书院图》 柴汝新(305)
7. 启功在莲池书院的题诗 柴汝新(308)
8. 范曾与莲池书院的特殊情结 柴汝新(311)
9. 从一副楹联看直隶图书馆藏书之命运 柴汝新(314)
10. 清代保定古莲花池图概述 柴汝新(318)

11. 历代书法家钟情的一副佳联 柴汝新(326)
12. 魏一鳌与清刻王阳明诗碑 柴汝新(328)
13. 保定古莲花池的《客座私祝》帖刻石 柴汝新 孙 月(330)
14. 重修保定古莲花池记 张立钢(335)

附 录

1. 莲池书院回忆录 邢赞亭(342)
 2. 保定莲池书院怀古 孙大鹏(348)
 3. 清宫珍藏莲池书院档案 (351)
 4. 莲池书院历代修建碑记 (360)
- 后 记 (367)

总论

重温历史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文化的复兴。莲池书院从清雍正年间始建，到清末1908年停办，在一百七十多年中，为我国教育和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谱写了绚丽的篇章。继承和发扬莲池书院精神，从莲池书院的学术风格上寻找教育和文化的根，从莲池书院的传统中寻找今后的文化革新之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莲池书院和传统文化的继承与革新

曹子西

莲池书院是清雍正年间开始创建的,到清末于 1908 年停办,中间存在了一百七十多年。从书院停办到现在又经过了九十多年,这期间莲池书院销声匿迹,好像真的不存在了。但是,一种真正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是不会死去的。今天我们重建莲池书院就是莲池精神的再生。新的莲池书院要以全新的风貌面向新的时代。然而,新的莲池书院离不开它的过去,离不开它过去的优秀传统。所以,我这个发言就从莲池书院的优秀历史传统谈起,来探讨传统文化的继承与革新的问题。

一、清代莲池书院建立和兴旺、发展的背景

在我国,很早就有学者在山林之间筑舍聚徒进行讲学的传统。孔子曾长期进行私人讲学,据说前后有弟子三千,最优秀的贤弟子七十多人。这种私人讲学活动可以说是书院的前身。唐代开始出现书院之名,但那是编书、藏书的地方,并不是学校。直到五代时期,含有学校意义的书院才正式出现。如南唐所建白鹿洞书院,就是最著名的早期书院之一。由于书院无论在教学内容、学习方法上都与一般学校不同,尤其在培养真正的经世济用和优秀的学术人才方面显然优于一般官私学校,所以自五代之后历宋元明清几代不衰。关于这些情况,我这里不多谈,现在单说莲池书院。

清朝初期,由于怕书院聚众讲学激起汉族文人的民族情绪于清王朝的统治不利,所以对书院千方百计地加以抑制。但到雍正年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已逐渐适应和接受了汉学的影响;同时,为笼络汉族文人也需要大力提倡中原传统的汉学。所以,到雍正十一年(1733 年),诏令全国各省普遍建立书院。因此,保定的莲池书院乃是在这种普遍的号召下于雍正十一年开始创办的。全国各地的书院各有长短,有办得好的,也有的是徒有其名。从整个情况看,清初书院多重

义理和经世济用之学。但到乾隆之后,书院为官方所控制,又变成了与一般官学相差无几的科举八股学校。所以到清末出现了一种改革书院的浪潮,出现了一批提倡朴学,重视经史和文、算、天文、舆地等学问,注意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所以,清代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书院发展很不平衡。但是,保定的莲池书院从一开始建立就奠定了较好的学术基础和良好的学风。尤其是在清末的几十年间,能够独树一帜,在全国有很高的学术声望,有的说它是清末“全国书院之冠”,有的说它是“北方书院之冠”,不论这些评价准确与否,起码说明莲池书院在全国确有重大影响。莲池书院为什么能如此兴旺发展呢?这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我以为,主要有以下三项原因:

第一,与保定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有关。

保定处于燕南赵北之地,它既有以赵文化为代表的典型中原文化特征,又受到处于民族交汇之地的燕文化强劲雄浑之风的影响。按理说很早就有形成自己文化特点的良好条件。但是,冀中地区古代多水域,保定东部就是涿易巨浸,所以在现在的保定市周围成县比较晚。从考古发掘来看,保定的早期文化主要是以西部满城一带的太行山东部大地上发育起来的。另外,由于保定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频繁的战事也影响了它在封建社会早期的文化发育。

可是,当北京的政治地位逐步上升,特别是自元代北京上升为全国的首都之后,保定在文化上的优势便很快凸显出来。北京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在它的周围形成了一个长期辅助北京的首都圈,在这个首都圈上形成一系列中等城市,如张家口、承德、天津、秦皇岛和现代城市唐山等。但唯有保定以文化发达著称。它不仅是京南的军事门户,而且是北京的主要文化辅助城市。

这一点,其实从金末就十分明显了。金末蒙古人占领了保定,对中原的传统文化造成很大破坏,而保定在中原文化恢复方面却遥遥领先。造成这种局面是与金末元初开辟保定的大将张柔的杰出贡献分不开的。张柔本为金将,后降蒙古人,从蒙古南伐,立过不少战功。张柔和他的副将贾辅虽为战将,但皆通经史。据记载,两家皆藏书万卷。他们随蒙古人打破开封,蒙古人只知烧杀抢掠,而张柔、贾辅却于金帛一无所取,唯留心于文物典籍,入史馆寻求金朝的实录,藏书大量运回北方。保定也曾被蒙古人“屠城”,使这座自北宋以来建立的州城毁于一旦。但当张柔重新开府保州时,不仅很快重建了这座城池,而且在1227年建城开府的当年就在城南建立了府学。而这一年,元初的大文人耶律楚材回燕京索取经籍。所以,保定在元初北方文化恢复方面,甚至略先于北京。后来,贾辅又在莲池之侧建万卷楼,将两家藏书和从

开封收集的一些典籍存于楼内。元初,蒙古人对汉族文人多歧视,所以有所谓七匠、八娼、九儒、十巧的戏言。这种情况下,张柔、贾辅于保州辟地千里,自霸一方,有很大独立性,无疑会引来许多北方元人前来避难。因而,在整个华北还十分混乱、荒凉的情况下而在保定开辟一块特殊的文化园地。元初著名文人郝经、毛正卿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万卷楼苦攻经史进行著述的。元朝后来又在保州设立培养医药人才的医学,建立培养天文人才的阴阳学,也是由于有张柔、贾辅等人早期奠定的文化基础。

明、清时期保定近在京畿,文化进一步发展。明洪武元年保定就设府学;洪武八年建清苑县学;正统年间创保定武学,后改为左王儒学。明代在嘉靖年间大办书院,据统计当时有书院 1239 所。保定在明代有两座书院,一所是金台书院,又叫二程书院;另一所叫上谷书院。由此看来,莲池书院在清代建立并很快发展起来不是偶然的。

第二,莲池书院在清代后期的发展,是有识之士针对封建社会末期官、私学校之弊和学术上的衰落、禁锢、偏颇所进行的批判、改革的结果。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清末又面临内忧外患,各级官学和地方私塾只能培养空疏无术的八股士子。在学术方面,一方面由于文字狱严重,使不少文人走进单纯考据的死胡同;同时,随着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又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一些有识之士鉴于这种情况,一方面想通过书院收集一些新的知识,同时又想从祖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古朴、实在、雄浑的优良传统,以抵制封建社会末期走向柔弱、俗媚的风气,以便振奋民族精神,从文化上寻找自强之路。从莲池书院的各位院长所提倡的学风来看,正表现了这种精神。如章学诚提倡史义、史德,反对烦琐主义;黄彭年主张博学多通;张裕钊想从桐城派古文和书法的改革中使中国的“古法”得以复兴;而吴汝纶反对“窳守旧术”,重视新学,开东西学堂等,都说明他们对改革文化方面的一片苦心。尽管在整个封建大厦行将倾覆的情况下,这种努力很难产生多大效果,但毕竟是在一潭死水中投入了几块石头,引起几番震荡,所以使莲池书院在后期能够声望日高。

第三,与书院近在京畿有关。

莲池书院设在皇帝的家门口,自然需要特别照顾这个门面。所以,莲池不同于其他书院,一是常得到朝廷直接物质支援;二是有皇帝和朝廷大员常来视察;三是常派名儒硕学主持书院;四是常得京师学术风气之先。有了这四条,莲池书院就能在一百七十多年中历久不衰,如张裕钊辞官南归时,李鸿章准备派他的女婿张又樵主

持莲池书院,结果引起上千名校内外弟子的骚动,李鸿章不得已,只好请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来接任,可见,莲池书院不同于一般省份的书院。

莲池书院设于北方名园之中,园中碑刻、文物古籍、书刻十分丰富,万卷楼藏有大量典籍。到莲池书院既可拜访名师,又能饱览名胜,同时又徜徉于文物墨宝之中。保定是文人进京必经之地,所以引来八方文人荟萃,这使莲池书院更增加了浓厚的学术气氛,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场所。可见,莲池书院当年所以那样兴盛是有浓厚的历史基础和社会原因的。

二、从莲池书院的几位院长看莲池学风

古代的书院建置十分简单,书院院长又是主讲,又称山长、洞主。下面仅设提调一人,管理行政和后勤。至于食宿、自学、学生管理,都由品学兼优的学生任“斋长”来兼任。所以,一位院长的学识和学风,经常是造成书院学风的主要因素。而各位院长又各有风格和特点,所以看一个书院的学术风格和总结它的传统特点最好的办法是以院长入手。莲池书院从开办到停办到底经历了多少院长现在已经很难统计,我们仅从一批最著名的院长来分析这个问题。

首先要谈的是章学诚。章学诚曾在乾隆年间任莲池书院院长。章学诚是卓越的史学评论家。当时,许多学者因害怕触犯时讳而避免接触实际而走入单纯考据的死胡同。章学诚也擅长考据,但他认为考据只是治学的工具,而不就是学问。他说,考据犹如舟子和旅客的关系,旅客不能不问目的地,整天瞎跑。他在刘知几提出的史才、史学、史识之外,又提出要重视史义和史德。史义,就是要对学术文化演变要有总体的演变的理解。史德,就是要重视客观事实,不能歪曲历史。所以,儒家经典只是历史记载,不仅考章句,还应该了解它们的源流,以便把握社会演进的客观之势。所以,反对烦琐主义,有志于用世,是他的最大特点。章氏的这种学术作风,奠定了莲池书院求实、济用的治学传统。

章学诚之后,有一位祁韵士来莲池主讲。祁韵士与章学诚同为乾隆四十二年进士。他学问渊博,曾任翰林编修、太子中允和户部主事。尤精于治史,并长于地域和中西交通之学。他著有《西域释地》,对新疆地区各个城市周围的山脉、河流、气候、特产、人口、历史沿革、现实状况无一不记述详尽。他又著《西陲要略》,先讲新疆交通里程,二讲新疆山脉河流,三记军台营塘,四记境内城池,五记职官、驻军、吏员,六记各域屯田,七记军队操练方法,八记新疆群牧,九记新疆各部族情况,最后记载衣食寇冀、风俗民情,全文长达三万余言。由此可以看出,祁韵士是一位脚踏实地、非

常注重社会实际的人,而不同于一般坐而论道的学者。

在清代中期,莲池书院大概受到全国书院科举八股化的影响,所以著名学者不多。但到清末,特别是从咸丰以后,又进入一个名师频出的时期,黄彭年、何秋涛、张裕钊、吴汝纶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就任于莲池书院的。

黄彭年是著名的史志学家,他曾在咸丰、光绪年间两度主讲于莲池书院,在书院创新、发展、文物搜集、教学与学术研究的结合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莲池书院在清未能突飞猛进的发展,居于各家书院之上,黄氏是立了大功的。黄彭年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是修光绪本《畿辅通志》。《畿辅通志》是一本记载河北详细情况的志书,它的修缮在清代有三次。第一次在康熙年间,主持人是郭棻,仅历十数日,草率成书,仅得四十六卷,所以后人评其简而不当,又多讹误。就是说,既有诸多疏漏,又不够严谨。第二次修《畿辅通志》在雍正年间,成书一百二十卷,并图一卷。这次就比较完善了。三修《畿辅通志》始于同治十年末,至光绪十年成书,达三百卷,并即时问世。这次修书的实际主持人就是黄彭年,修书的地点就在莲池书院。史和志的方法和体例有同有异,志书应当全面反映一个地区的自然与社会状况。黄彭年在这方面确有一定史识。他广泛搜集资料,经过十年艰苦批阅,汇辑成书,为后世保存了大量可靠参证的资料。当时的同事者张裕钊和吴汝纶是文章家,黄彭年是学有所成的史志学家,对编修的方法、好坏的判断自然有所不同。所以张吴二说黄氏之体“篇不成文,无异档册”,后来学者也多有以这种观点批评黄氏所编《畿辅通志》的。而黄彭年能坚持志书的特点,办排众议,终于完成了这部多达三百卷的巨制史书,其见识和毅力都是超常的。所以,至今真正的方志学家,对这部大书的评价极高,普遍认为这是我国方志学史上的一大豪举。

黄彭年在编写《畿辅通志》时还吸收了不少书院优秀的学生参加,这种从实践中培养学生学术能力的精神十分可贵。至今保定学人重实干,无论著作、刊物皆以苦攻苦干而取胜,这不能说不受莲池传统的影响。

黄彭年之后有张裕钊。张裕钊是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深得曾国藩古文之法。他在人品上却是如莲池之荷,出污泥而不染。他的一生大都是在书院度过的。他是湖北武昌人,24岁时中举,道光三十年(1850年)试国子监正学录,获得曾国藩知遇,任内阁中书。仅两年,便弃官不作,归故乡主讲于芍庭书院。同治十二年(1873年)又就任于湖南凤池书院,光绪九年(1883年)开始主讲于莲池书院,到光绪十五年(1888年)辞职,在莲池执教五年。此后又到武昌江汉书院、襄阳鹿门书院,最后在西安隐居去世。可见,张氏一生忠诚于教育事业,所以成就君学甚众。他在培育人才

方面,确实是呕心沥血,并能不拘一格,打破世俗之见。张氏以文为事,但最著名的还是书法。他的书法既吸收唐碑特点,又着重于北碑性格,同时又有自己的创新。他创造了一种内圆外方的书体,又善用中锋。康有为把张裕钊誉为清朝四大书法家之一,说他的书法高古浑穆,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来无与伦比”。对这种评述虽然书界有不少人认为未免过高,但张氏书法确实有开创时代的意义。就是说,他为了反对明清以来艺术上巧媚俗态,而追寻古拙,但又要从古拙中创造新的意境。凡是创新、开拓,不能要求十分完善,但往往也很难说一下就是顶峰,但那毕竟是开拓。有人说张氏书法有三大特点:一是能入古出新;二是理解我们本民族的审美心理,新而不怪;三是既作艺术家,又作学问家,学识深厚广博,所以艺术上才得真谛。

然而,真正继承和发扬张裕钊书法成就的却是日本人。这就是莲池书院第一位留学生宫岛大八。宫岛远渡重洋专拜于张先生门墙之下,后来又从其到武昌、陕西,张先生在西安逝世时,只有宫岛这个学生在身边。宫岛回日本,还创办了第一个汉语学校善邻书院,并进一步传播先生的学问,在日本书法界形成一大流派。为了纪念张裕钊和宫岛大八的师生之谊,几年前日本人专程来华立师生友谊之碑,此碑就在莲池内的西小院。

张裕钊之后就是吴汝纶。吴汝纶为同治四年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和深、冀二州的知州。所以,他既是学者,又是有实际社会经验的人。不仅学贯古今,而且通达时变。他任莲池院长十五年,其后就任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吴汝纶是个维新派,曾帮助严复审阅《天演论》讲稿。他主张重视新学,变法自强,不仅更多的招收外国留学生,还首次设日英两国外语,并聘请了外籍教师,同时勉励学生出国留学。

纵观莲池这些院长的学术风格,虽各具特点,但有几个共同点,即:

1. 重视经世济用,反对空疏说术。
2. 能够入古出新,从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吸取对现实有益的影响。
3. 不抱门户之见,能将南北学派合流交融。
4. 自身学有所长,学有所成,以自身典范而示以弟子。

如果问什么是莲池传统,大概这几条就是最主要的东西。这些精神,直到现在对我们都有很大启发。

三、莲池书院在我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

莲池书院在清代的一百七十多年中,为我国教育和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